



地区简报

大中华地区

“行动起来：大中华地区的工商企业与人权”

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

2014 年 8 月

经济的快速增长支持大中华地区在实现许多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企业（不论是中资企业还是总部在海外的企业）和政府具体的人权实践距达到国际企业与人权标准（如《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还有很大差距。本简报调查了针对劳动权利、环境污染、表达自由和隐私权等关键领域的侵权指控，并分析了企业的应对之道——在大中华地区运营的外国企业对指控的回应率为 77%，总部设在大中华地区的企业回应率为 50%。简报建议企业和政府迅速采取有效的行动，把人权整合到企业经营中，让企业、工人和当地社区都能受益。

以下几个因素意味着大中华地区就企业与人权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工人和社区大规模的维权运动；企业愈来愈认识到负责任运营的必要性；政府对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和不稳定局势的深切关注；现有框架扎实有力，能提供切实的指导。

目录

1. 摘要	3
2. 国际和地区背景	5
3. 中资企业和在该地区经营的跨国公司如何回应侵犯人权的指控?	6
3.1 回应率	7
3.3 中资企业在海外有侵权指控的国家	10
3.4 行业	10
3.5 评估企业回应的质量	11
4. 大中华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13
4.1 劳动权益	13
a. 结社自由	13
b. 健康和安全问题（包括死亡事故）	14
c. 童工	14
d. 强迫劳动	14
e. 歧视	14
4.2 影响健康的污染	15
a. 抗议大型项目造成的污染	15
b. 制造等行业造成的污染	15
c. 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	15
4.3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公司与政府合作侵犯表达自由及隐私	16
4.4 强制拆迁/ 土地权利	16
4.5 食品安全问题 – 威胁公共健康和人权	17
5. 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人权影响	17
6. 企业的法律责任	18
6.1 劳动争议	18
6.2 环保诉讼	18
6.3 其它趋势	19
7. 有关工商企业与人权的重要活动	19
8. 结论与建议	19
针对企业的建议	20
针对政府的建议	20
9. 本简报作者	21
10. 关于资源中心	21

1. 摘要

中国人口占到世界的近五分之一，经济规模全球第二，GDP 每年的增长率超过 7%。政府和企业驱动着经济快速增长，在 30 年的时间里帮助 5 亿人摆脱了贫困。作为少数几个已经达到了所有 2000 年设立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之一，中国为人权进步做出重大贡献，人民拥有谋生、教育等权利。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普遍存在着对其他基本人权的漠视行为，如劳工权利和表达自由权利；伴随而来的还有大规模的污染，不仅危及公民健康，有时甚至危及生命。

简报强调，鉴于以下综合因素的出现，大中华地区有着在企业人权方面取得进展的好机会：

- (1) 工人为争取更好待遇展开大规模维权活动，以及针对工业项目造成的环境影响、强制拆迁的抗议活动；
- (2) 企业愈来愈认识到负责任经营有助于避免、减少动乱，保护企业信誉；
- (3) 政府（包括国家和地方）非常关注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状况、环境破坏和公众不满情绪；
- (4) 现有框架扎实有力，可供有意正确行事的公司和政府遵循，包括《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大中华地区企业尊重人权取得实质性进步将有助于推动、支持在地区平等的发展机会；有助于建立更多可信赖、可持续的公司；有助于增强脆弱群体及寻求公平、人类福祉的公民社会的话语权。

企业对人权指控的回应

我们关注大中华区和全球其他地区的企业对人权的侵犯和改善，事实显示每天都在发生重大的侵权事件。我们会先邀请企业就公民社会有关它们行为的顾虑作出回应，然后将相关的材料刊载到我们的网页上。本简报分析了 223 次这样的接洽：其中 127 次是针对总部在大中华区的企业（中资企业）——包括其在大中华区内或在海外运营中所涉及的人权问题；96 次针对总部设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企业（跨国企业），有关它们本身或其在大中华区内供应商的人权侵害指控。

公民社会组织对总部设在大中华地区的企业（中资企业）的人权影响进行越来越严格的监督。从 2005 年以来，我们就具体的侵权指控接洽中资企业的次数几乎翻了两番。¹

跨国公司的回应率是 77%，而中资企业的回应率则是 50%。然而，虽然大中资企业较少回应，但在那些作出回应的企业当中，针对公民社会所提出的大部分或所有问题详细地进行逐条回答的，中资企业 (52%) 比跨国企业 (38%) 要多。

我们接洽的中资企业中有半数确实意识到有必要公开回应公民社会对其人权行为的质疑，并且也比跨国企业更倾向于作出较详细的回应，这都显示许多中资企业愿意公开直面人权问题。在大中华区企业中，私营企业 (56%) 比国有企业 (40%) 较多作出回应。

另一方面，跨国企业较常在回应中承认指控，并且承诺作出改变。另外，中资企业所承诺作出的改变包括改善与工人和社区的沟通、监管超时工作、落实卫生和安全要求等。跨国企业的承诺包括加强对供应商的培训和监测（有时涉及第三方）、以及敦促供应商改进劳工权益或环保实践（有时会声明如果没有改善，将会中断合作）。

大中华地区的侵权指控

在本地区，我们寻求企业回应的最频繁的指控涉及工人权利（占到我们寻求公司回应案例的 68%，包括中资企业和在本地区经营及采购的跨国企业）。

¹ 2005-7 年间，我们就指控问题与 GC 公司联络了 21 次，在 2011-13 年间是 79 次。

中国有 2.6 亿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他们遭遇的常见劳动侵权包括超长工作时间、危险的工作环境以及所得工资不足以维持生计。远离家乡，有时还远离孩子的压力使得他们的境况雪上加霜。由于不能加入独立工会，他们谋求改善环境的努力面临着巨大障碍。但是如简报所示，这些工人尝试采用创新办法来争取的努力迅速增加。高比例的劳工权利案例也显示了通报这些问题的劳工组织的积极工作。

在大中华地区，我们寻求企业回应的指控中，20%与影响健康的污染相关。近年来反对造成污染的工业项目的抗议急剧增多，有时候成功地改变或阻止了这些项目。简报还介绍了环保非政府组织（NGO）对电子公司代工厂造成危害极大的水污染的抗议活动，以及一些企业更迅速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

简报强调的第三个企业与人权重要问题是有关大中华地区内外互联网技术公司在政府审查监控网络活动中的合谋行为。此外，简报还讨论了在工厂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强迫拆迁情况，以及食品安全恶性事件。

我们就大中华区的人权问题与企业总共进行了 152 次接洽，其中 56 次为中资企业，96 次为总部不在本地区的公司（跨国公司）。在区内运营的跨国公司总体回应率为 77%，中资企业为 50%，虽然后者的回应率低一些，但是接洽的中资企业中有半数确实认识到有必要公开回应公民社会对其人权行为的质疑，这充分显示许多中资企业愿意公开直面人权问题。在中资企业当中，数据显示私营企业的回复率（56%）高于国有企业（40%）。

做出回应的企业中，“逐条”做出回应的中资企业（52%）多于跨国公司（38%），即直接解答公民社会对特定问题提出的所有或者大部分质疑。但是我们的统计也显示，该地区的跨国公司比中资企业更有可能在回应中承认指控，并承诺做出改变。中资企业做出的改变承诺包括就工人和社区的顾虑改善沟通、监控超时工作、落实卫生和安全要求等；跨国公司做出的承诺包括加强对代工厂（有时涉及第三方）的培训和监督、敦促供应商改进劳工权益或环保实践（有时会声明如果没有改善，将会中断合作）等。

海外对中资企业的侵权指控

除了在区内的企业与人权影响外，本简报还论及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人权影响。我们与中资企业进行了 127 次接洽寻求回应，超过半数指控有关它们在海外的行为（71 次）。这些案件反映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广度，例如截至 2011 年底，[有 18,000 家中资企业在全 177 个国家运营](#)。我们就侵权行为与海外中资企业的接洽中，案件涉及的国家非常广泛，其中最多发的国家为缅甸（24%）、柬埔寨（9%）、印度（9%）和刚果民主共和国（6%）。这些案件涉及的最主要问题是安全与冲突区域、工人权益和强制拆迁。许多吸收了大量中国投资的国家欢迎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做法和高效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但当地社区对中资企业的经营多有抗议，以致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访问非洲时[敦促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许多中资企业现在都认识到，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负责任经营会降低社会抗议风险，保护企业信誉。2013 年，全球企业与人权倡议与当地及国际合作伙伴[主办了企业高管大会和从业人员圆桌会议](#)。梁晓晖先生，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院企业与人权讲师在会上发言说：“随着中国公司的不断全球化，非营利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中国公司正在将人权纳入其管理体系中。即使在中国，他们也无法回避这个话题。国际公约的条文不断融入中国法律，而这些法律的执行也越来越严格。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中国公司都必须遵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有尊重人权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积极敦促中国企业要负责任经营，例如，政府出台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并为此成立了[“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制定了《绿色信贷指引》，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注重绿色信贷，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为进一步保护人民权益，中国还修订了[《环境法》](#)、[《劳动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尽管许多[NGO 对这些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存有疑虑](#)。

中国政府已经核可了《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指导原则》），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收到的回复中没有一家中资企业或跨国公司提及《指导原则》。在日内瓦举行的“2013年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论坛”有大约 1500 人参加，其中中国代表非常少，与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不成比例。

现在是中国推动“工商业与人权”议程的关键时机。本简报最后为企业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清晰建议。针对企业，简报呼吁他们明确采纳公共人权政策；对国内外业务进行彻底的影响评估；实施明晰的人权管理程序；向公众通报进展；与批评者合作；补救侵权行为。

简报呼吁中国政府制定国家工商业与人权行动计划；加强法律框架，帮助权利受到企业侵害的人寻求、获得补救；严格执行现有的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法律；加强对在国内外经营的中国企业的保护人权指导。

本简报显示，在大中华地区经营的企业的实际做法与《指导原则》等全球公认的企业与人权标准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现在需要行动起来消除这一差距。这么做不仅符合企业自身利益，更对受企业活动影响的工人和社区的福祉至关重要。

关于地理区域的说明：本简报覆盖大中华地区，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并提供总部设在区内企业在海外的活动信息。我们了解到本简报中提及的问题（劳工权利、表达自由、环境保护等）在大中华各地区的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情况。

2. 国际和地区背景

2011 年 6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国（包括中国）通过了[《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由此《指导原则》成为了全球所有国家和工商企业在工商业和人权领域应遵循的实践标准，但是许多人权倡导者认为还需要更有约束力的框架或[条约](#)。联合国特别代表约翰·鲁格 2008 年向联合国提出了“保护、尊重和补救（救济）²”框架，制定《指导原则》旨在将此框架投入实际应用。框架包括三个支柱：

- 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
- 公司尊重人权的责任
- 获得补救（救济）（需要有更多途径让与企业有关侵害行为的受害者能够获得补救）

联合国对《指导原则》第二个支柱的“[诠释指南](#)”说明：“虽然《指导原则》本身并不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它阐述了各国及工商企业现时标准与实施的意义，也涵盖了各项国际法和本土法律中不同程度的要点。”《指导原则》本身规定：“尊重人权的责任是对无论在何处营运的所有工商企业的全球性预期行为标准。它的存在，独立于国家履行其自身人权义务的能力和/或意愿，不会克减这些义务。”

[中国在 2009 年人权理事会的发言中表达了对“保护、尊重和补救（救济）”框架的支持](#)：“中国代表团赞赏人权与跨国公司及其他商业企业特别报告员所提交的报告，并完全支持其工作。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继续促进和保护公民经济和社会权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问题应引起国际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包括国家和私人部门等各方在其中承担其相应的责任，携手共渡难关。中国赞赏特别报告员所提出的『保护，尊重和救济』的框架，认为该提议具有价值意义，值得各国认真研究。同时，在这一框架下，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合作亦十分重要。只有通过双方的互信与合作，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和双赢，实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共同目标。”

² “Remedy”，联合国官方译文用语为“补救”，中国大陆法律界普遍翻译为“救济”

而在 2011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在有关《指导原则》的发言表示](#)：“中国赞赏保护、尊重和救济框架”，并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在国内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努力。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并为此成立了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银监会制定了《绿色信贷指引》](#)，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注重绿色信贷，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为进一步保护人民权益，中国还修订了[《环境法》](#)、[《劳动合同法》](#)、[《土地管理法》](#)，但是许多 [NGO 对这些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存有疑虑](#)。

通过《指导原则》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 2011 年成立了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任期三年。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推动《指导原则》的有效、全面传播和执行”。之后，[许多国家已经拟定或者开始拟定自己的企业与人权行动计划](#)（其中有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和英国）。在许多地区，[企业已经开始在经营中采纳《指导原则》](#)。[公民社会组织在其倡导工作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到《指导原则》](#)。

2013 年 12 月 2-4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届年度“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论坛”，会上大家探讨了执行《指导原则》的趋势和挑战。与其他地区相比（包括相邻的东南亚和南亚），大中华地区的参加者相对非常少。

本简报进一步说明，大中华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对于《指导原则》和企业与人权事务的认知普遍偏低。因此，当地的公民社会在传播、执行《指导原则》中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作为第一步工作，首先区内各方的角色要认识到许多迥然不同的趋势和问题（见第 4 节阐述）都属于“企业与人权”领域的范围，将其结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问题，凭借令人信服的叙述和共同的语言来应对。有了这种共同的理解，就可以加强各方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并利用工具防范侵犯人权行为，减少负面影响。为此，几家 NGO（SOMO、CEDHA 和印度 Cividep）联合编制了[如何将《指导原则》应用于企业研究与倡导：公民社会组织指南](#)。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尽管一些公司努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许多当地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开展了改善企业影响的倡导工作（尤其在环境和劳工方面），但少有企业采取注重人权的方式来解决它们供应链中的问题。以香港为基地的企业社会责任亚洲(CSR Asia)，主席威理夫(Richard Welford)举了几个企业可能不愿意参与人权工作的原因，其中包括不承认问题的存在、担心吸引非政府组织的关注、以及感到这些问题太大，他们的参与也无补于事。与此同时，企业和民间团体对《指导原则》的运用也相当有限。

3. 中资企业和在该地区经营的跨国公司如何回应侵犯人权的指控？

数据说明：

从 2005 年起，在把公民社会组织提出的指控发布在网站上之前，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会先邀请企业回应（如果在公共网络上未找到该企业已有的回应）。此种举措旨在确保资源中心涵盖信息的公平性，同时也鼓励企业公开面对人权问题。

简报介绍了大中华地区的案件和企业回应（无回应）所呈现的趋势，我们就人权问题与企业共进行了 223 次接洽，所有案件的详情见此处 [点击下载表格](#)，其中包括：

- **127 次接洽**，针对总部位于大中华地区的企业（“中资企业”），即总部设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其中包括国有企业，如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私营企业，如电信企业中新赛克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台湾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团。备注：**44%**的指控有关发生在大中华地区的侵害行为，**56%**有关发生在海外的指控。我们与一些企业针对不同指控接洽多次。

- **96 次接洽**，针对总部设在大中华地区以外的企业（“跨国公司”），指控的侵害行为都发生在大中华地区。接洽的企业有阿迪达斯、苹果、德意志银行、家乐福、谷歌和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

指控来源包括：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援引工人或社区居民指控的媒体报道。

3.1 回应率

尽管企业的回应率³可能或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作为，回应的质量也不尽相同，但回应率还是一个重要指标，表明了企业对解决社区和广大公民社会提出的人权问题的坦诚程度。

从 2005 年到 2014 年 4 月，我们与总部设在大中华地区的企业（以下称“中资企业”）和在大中华地区经营的外国企业（以下称“跨国公司”）接洽了 223 次，邀请他们就人权指控做出回应。总体的回应率为 62%（中资企业 50%，跨国公司 77%）（见图 1）。全球企业的平均回应率为 70%。

虽然中资企业的回应率低一些，但是接洽的中资企业中有半数确实认识到有必要公开回应公民社会对其人权行为的质疑，这一重要事实显示许多中资企业愿意公开直面人权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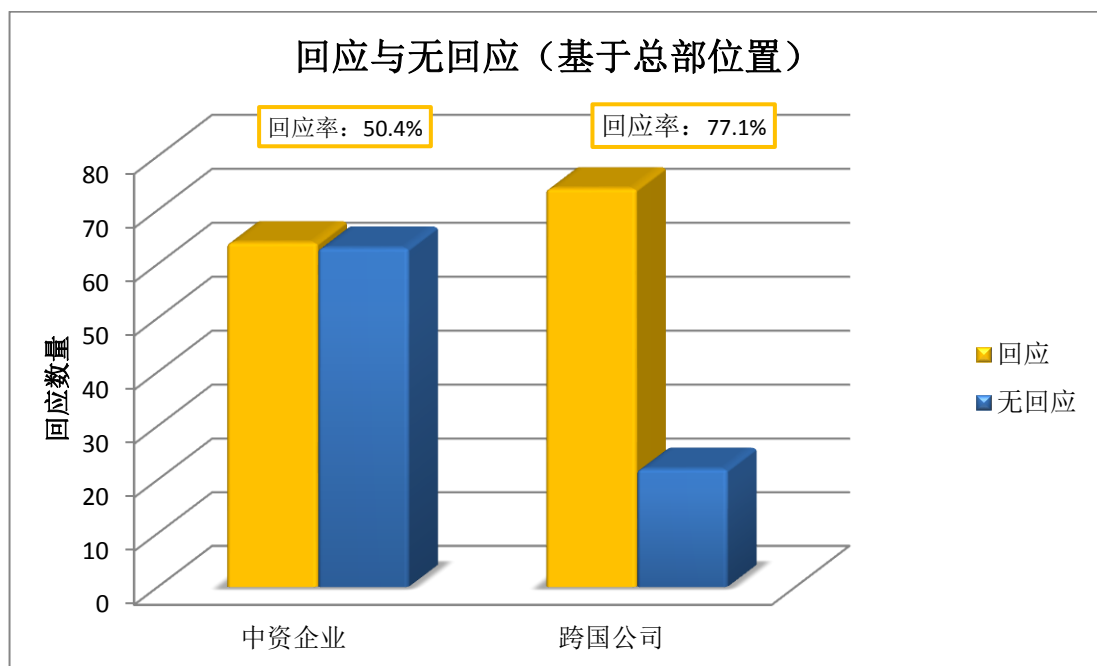


图 1

比较国有企业⁴和总部设在本地区的私营企业的回应率，前者为 40%，低于后者的 56%（见图 2）。我们的经验也表明接洽国有企业通常较难，直接联系的公开渠道非常有限。尽管国资委公布了一份国有企业新闻发言人名单，但 Techweb 发现，按照名单提供的联系信息，[120 家国有企业的新闻发言人有过半](#)都联系不上。

³影响我们从某个国家寻求回应的次数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公民社会组织在该国的活跃程度；企业对特定指控已经公开做出回应的程度；资源中心寻求回应的能力。

⁴ 使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国有企业的广义概念，包括纯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
http://www.stats.gov.cn/statsinfo/auto2072/201311/t20131104_45490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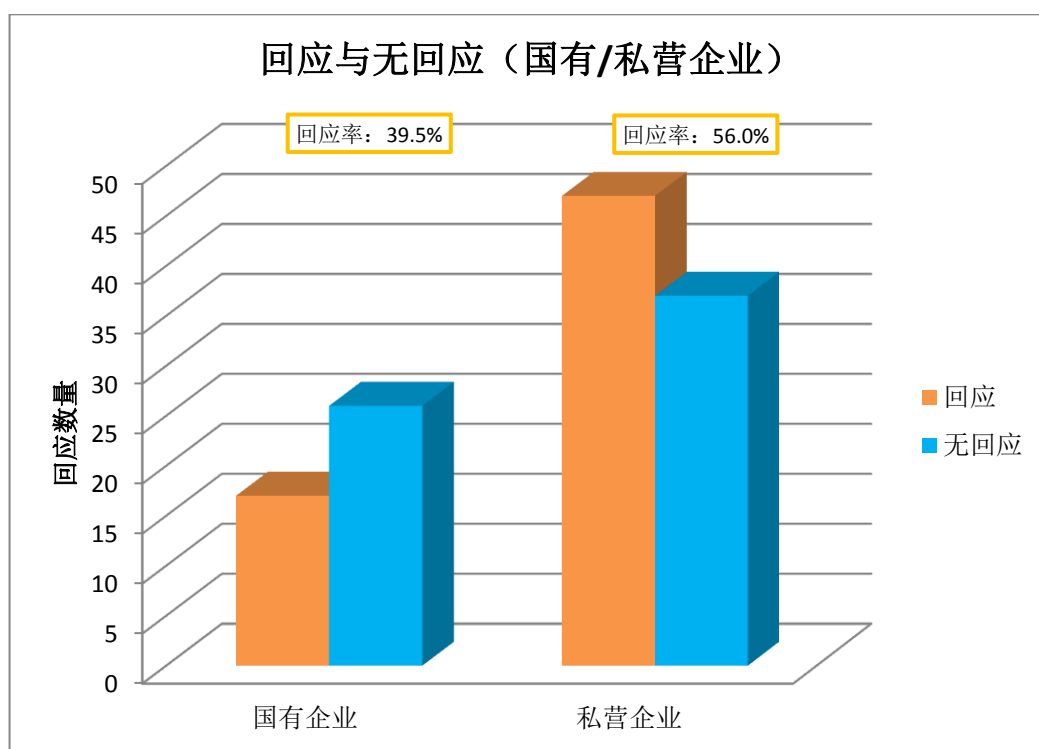


图 2

联合国全球契约（契约）是一项国际政策倡议，加入契约的企业承诺遵守人权、劳工权益、环境和反腐败领域的十项原则。在我们的样本中，总部设在和不在大中华地区的契约成员和非成员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回应模式。对于中资企业，契约成员的回应率（33%）低于非成员（53%）。对于在本地区经营的跨国公司，契约成员回应率（82%）高于非成员（74%）（见图 3）。

鉴于样本数量较小，特别是总部设在中国的契约成员只有 18 个，我们不试图从中得出具体结论。但是我们鼓励所有企业，不论是否为契约成员，都对外部利益相关方提出的人权影响问题做出更积极的回应。这一数字应该激励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敦促其成员的经营模式中纳入人权问责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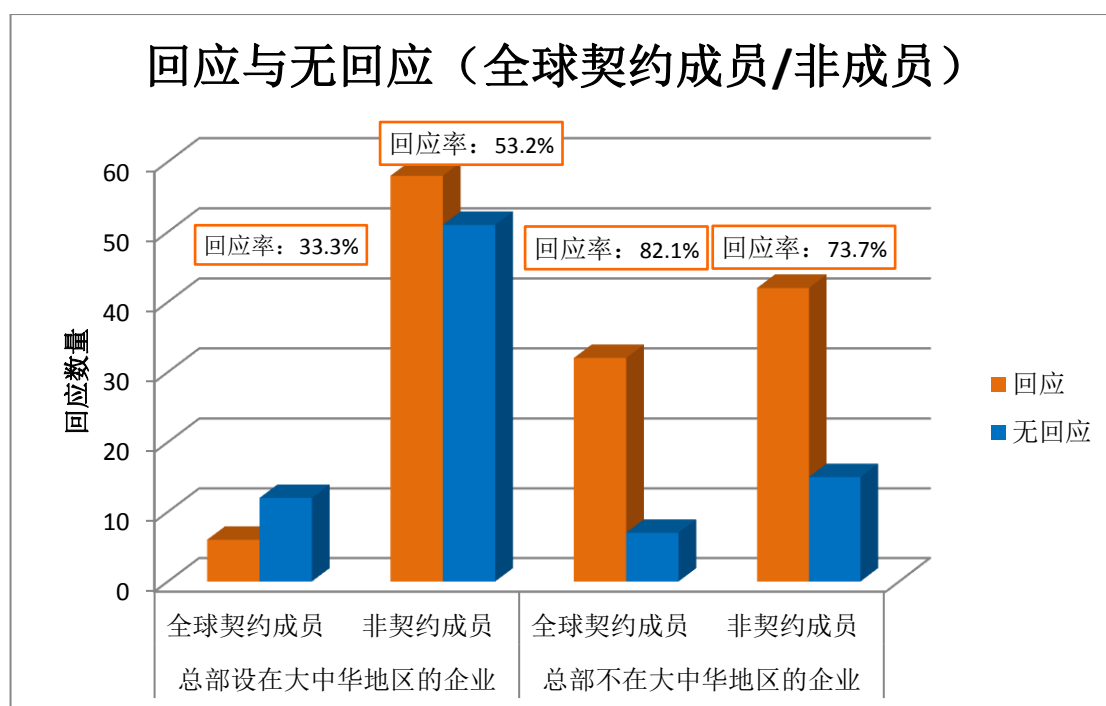


图 3

3.2 问题类型

在大中华地区，我们邀请企业回应的最频繁指控涉及工人权益（见 3.1），占到我们寻求公司回应案例的 68%，包括中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见图 4）。有关污染和健康问题的指控（20%）排在第二位，互联网技术公司在政府审查监控网络活动中的合谋行为（6%）排在第三位（见 3.3）。绝大多数指控都有关劳动权益问题，这一方面突出了侵害劳动权益行为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报告这些行为的劳工团体的积极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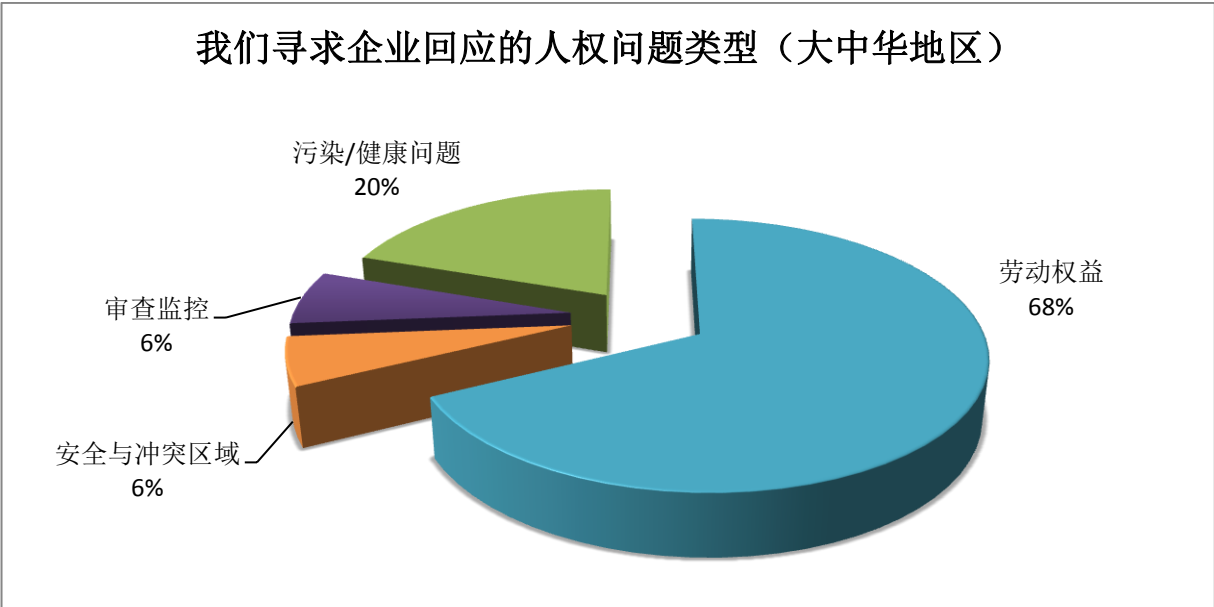


图 4

对在海外经营的中资企业的侵权指控不同于在本地区发生的侵权行为。对这些企业最多的指控有关安全问题和冲突区域（37%），其次分别为劳动权益（24%）和强制拆迁（20%）（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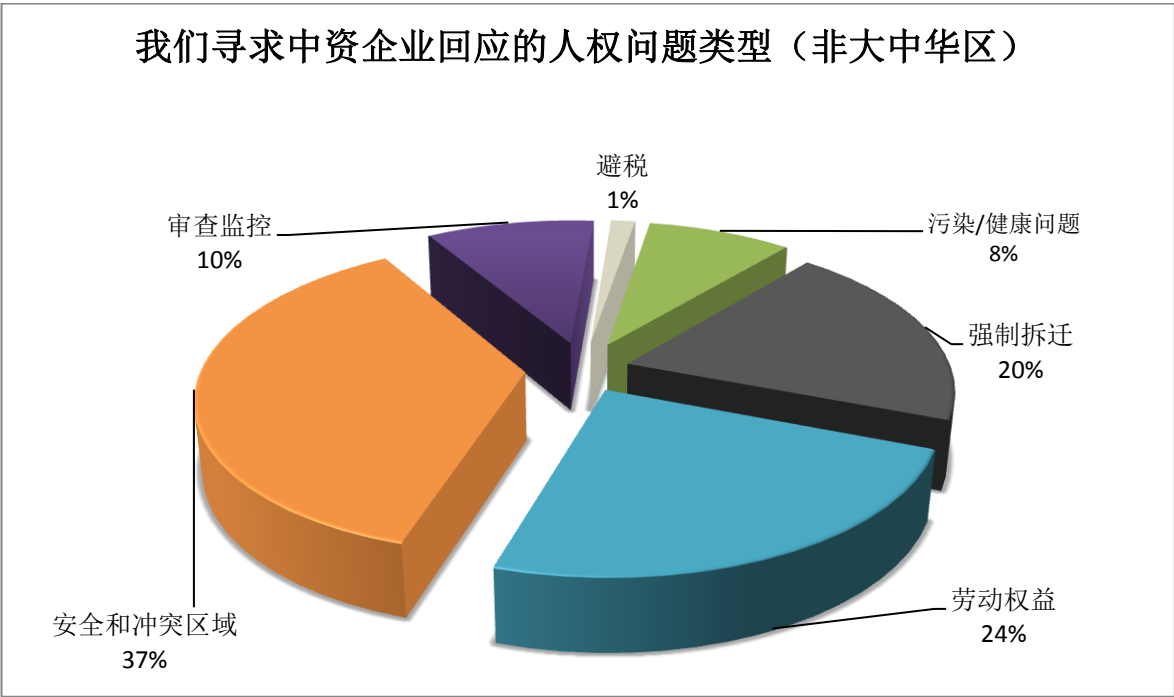


图 5

3.3 中资企业在海外有侵权指控的国家

我们与中资企业进行了 127 次接洽，超过半数的指控侵权行为发生在海外（71 次）。侵权指控涉及全球许多国家，其中最多发的为缅甸（24%）、柬埔寨（9%）、印度（9%）和刚果民主共和国（6%）。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对全球的重要影响、人权问题常常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以及在海外开展业务前进行妥善影响评估的必要性（见 4.6 节和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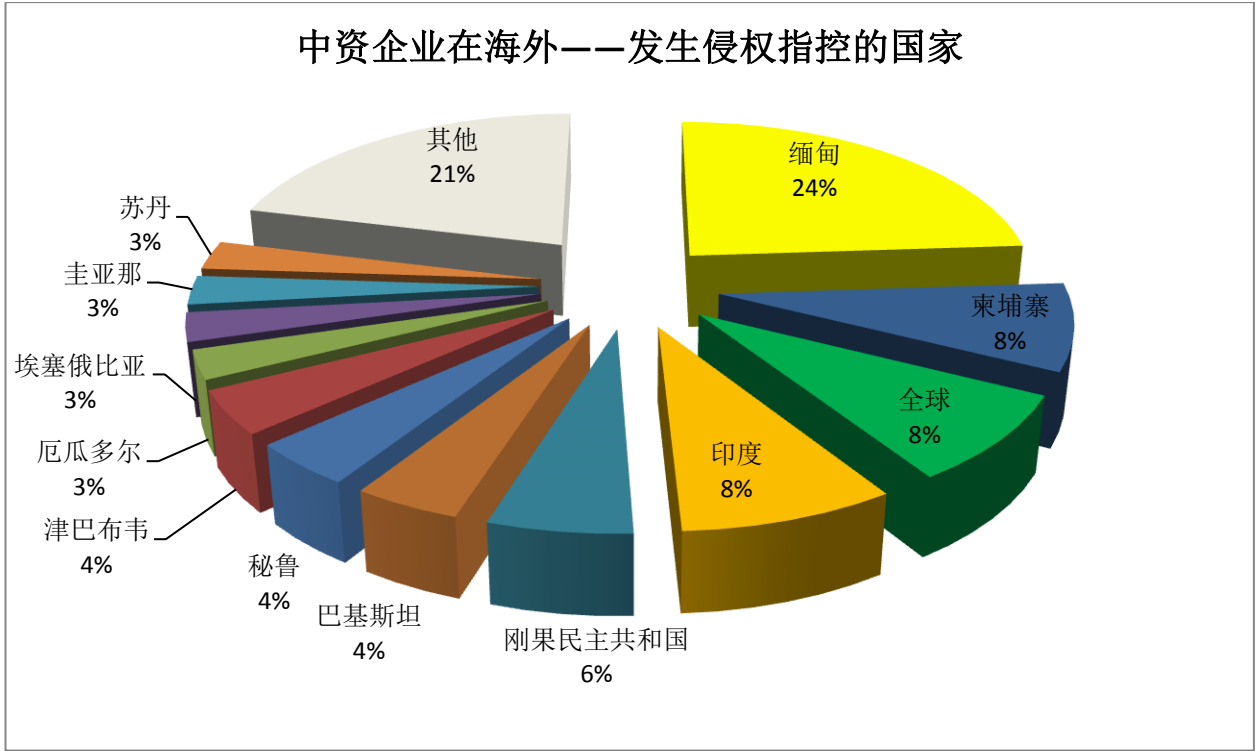


图 6

3.4 行业

我们寻求回应的企业来自各个行业。但不论中资企业还是跨国公司，“技术、通信和电子”行业都占据了最高比例（41%）（见图 7）。该行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劳动权益、审查监控和水环境污染。其次是制造行业（17%），主要问题也是劳动权益。之后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企业（15%），主要问题通常涉及污染/健康和强制拆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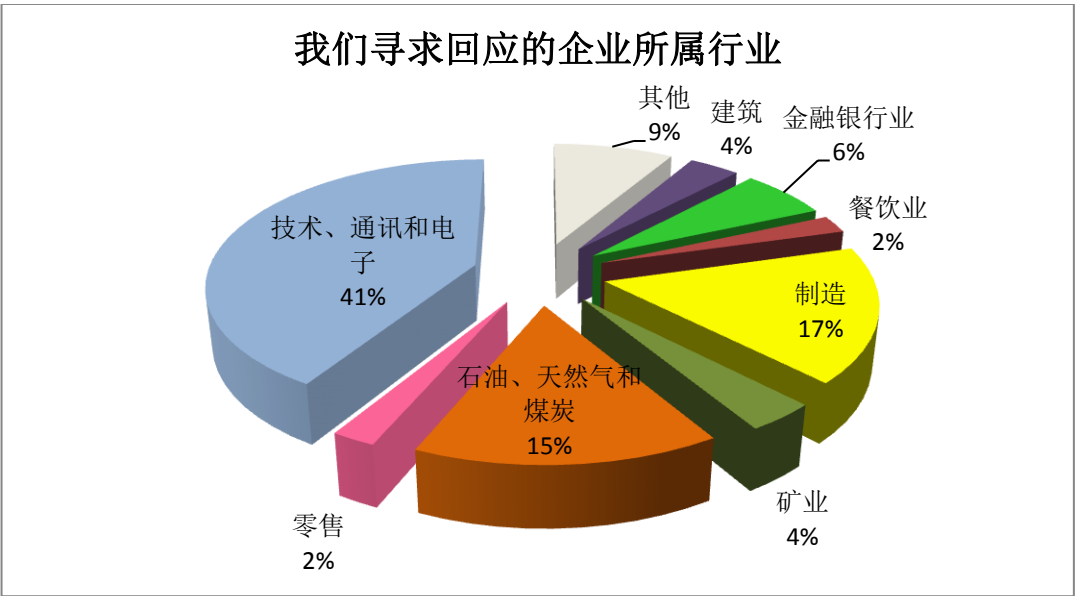


图 7

3.5 评估企业回应的质量

除了记录企业回应的数量，我们还从四个角度评估了这些回应的质量。我们对 138 份回应一一审阅，回答以下问题：(1)企业是否承认、部分承认或否认指控？(2) 企业是否对提出的具体问题直接“逐条”详细回复，还是笼统回复？(3) 企业是否承诺改变？(4)企业的回应是否提到了国际标准或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我们根据企业总部所在地对结果进行了比较。

问题 1：企业是否承认、部分承认或否认指控？

我们的数据显示，承认或部分承认指控的跨国公司（分别为 9% 和 23%）稍多于中资企业（分别为 6%和 17%）。否认指控的中资企业有 61%，跨国公司有 41%（见图 8）。跨国公司比中资企业更倾向于在回应中表示他们将“进一步调查”。图 8 中的“其他”包括模棱两可或建议我们接洽另一实体的回复。

我们明白企业承认或否认指控并不一定说明实际上发生了或未发生指控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企业回应对于引导围绕指控展开的对话非常重要，通常在解决争端过程中会发挥核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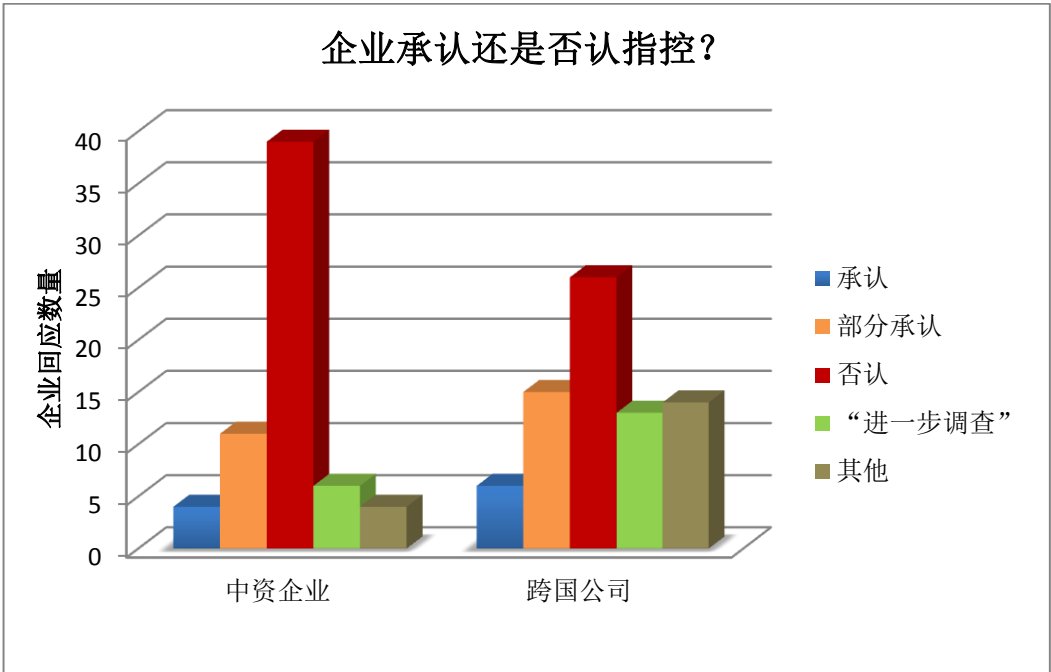


图 8

问题 2：企业是“逐条”详细回复，还是笼统回复？

我们对企业是“逐条”详细回复还是仅提供笼统声明进行了评估。我们把“逐条”回复定义为企业针对公民社会提出的大部分或所有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逐条”回复通常更有意义，因为能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多信息，显示出企业愿意进行对话的更开放态度。不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详细回复不一定意味着其中呈现的信息更为真实。

样本中的中资企业倾向于提供更为详细的回复：提供“逐条”回复的中资企业（52%）多于跨国公司（38%）（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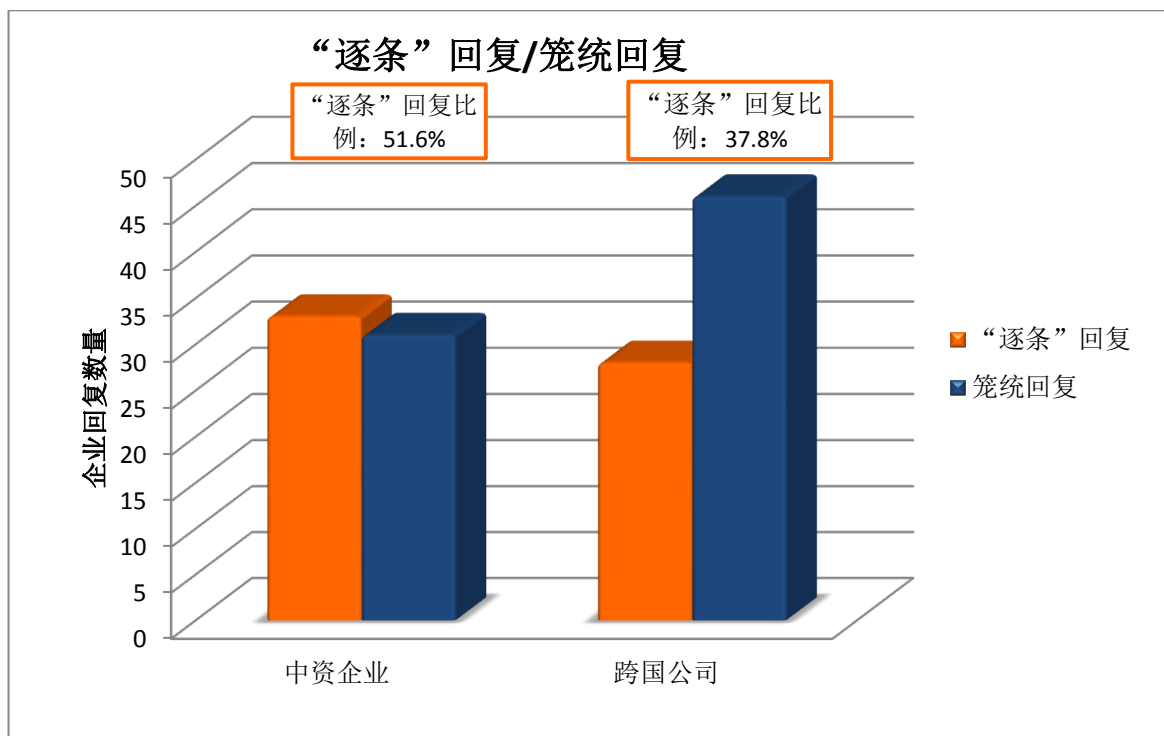


图 9

问题 3：企业是否承诺改变？

根据收到的回应，在本地经营但总部不在本地区的跨国公司（38%）比中资企业（33%）更多做出改变承诺（见图 10）。中资企业做出的承诺包括就工人的顾虑改善沟通、监控超时工作、落实卫生和安全要求；跨国公司做出的承诺包括加强对代工厂（有时涉及第三方）的培训和监测、敦促供应商改进劳工权益或环保实践（有时会声明如果没有改善，将会中断合作）。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公开宣布的行动得到落实。这也给相关的公民社会组织提供了机会，例如提出侵权指控的组织可以采取办法检验这些行动是否得到实施。这符合《指导原则》第 16 条原则，即要求企业表示承诺履行尊重人权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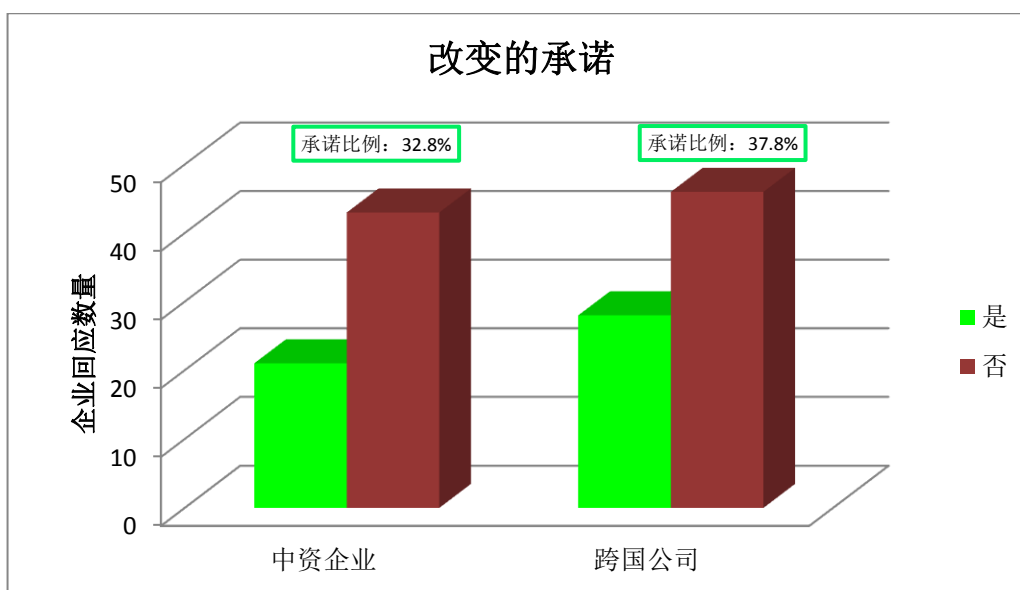


图 10

问题 4：企业回应是否援引了国际标准或多方利益相关者和行业性倡议？

在收到的回应中，援引了国际标准或多方利益相关者和行业性倡议的跨国公司（30%）稍多于中资企业（23%）（见图 11）。

回应中援引最多的标准是电子产业公民联盟（EICC）的行为规范，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接洽的电子企业的劳动权益问题相对较多。一些企业在回应中援引了《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原则》。但令人关注的是，我们收到的回复中，不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在本地区经营的跨国公司，都没有提到 2011 年通过的《指导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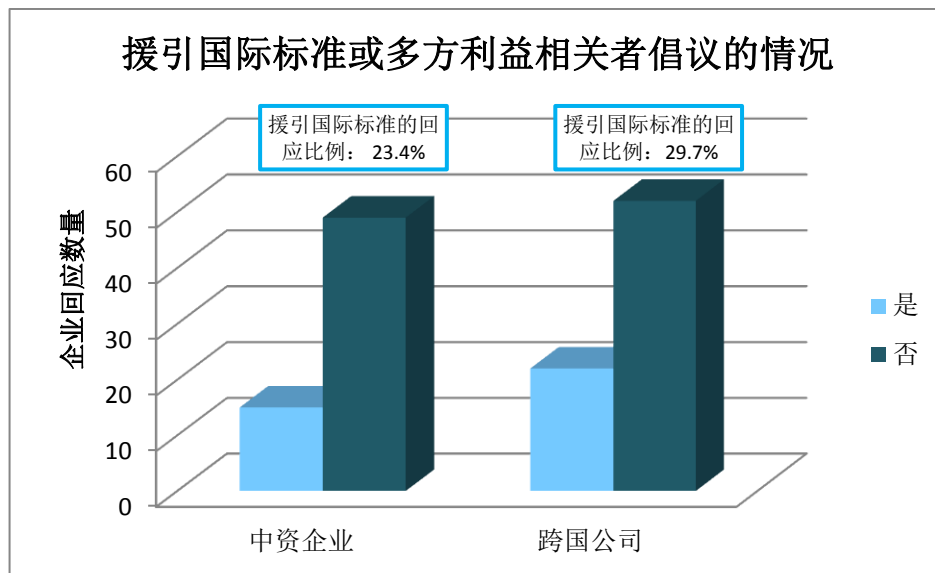


图 11

4. 大中华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劳动权益

在中国，我们寻求企业回应的所有侵犯人权指控中，超过半数（68%）都与劳动权益相关。这说明了中国工人所处的环境不佳，他们没有权利组织独立工会。许多都是农民工，他们面临更多挑战，包括远离家乡，有时几个月或甚至几年都见不到孩子；有 2.6 亿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常见的侵犯劳动权益做法包括过长的工作时间、工资水平不足以维持生计及工人自由迁移受到限制。

大量有关劳动权益的问题被曝光也证明公民社会在积极报告这些问题（有些其他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曝光）。20 多年来，中国劳工通讯一直在关注并促进中国工人的权益，更注重行动的组织（如中国劳工观察、设在香港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发布了无数报告，揭露各种品牌和行业（包括电子和玩具）使用童工和有害化学品的违法行为。

a. 结社自由：中国规定所有工会必须隶属于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独立工会是违法的。不过，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工厂工人抗议的次数在增加。2011-2013 年，有记录的各行业工人抗议总数达 1171 次。缩减成本、没有有效的申诉机制和劳务机构违反人权的做法是工人抗议的几个主要原因。更多时候是政府和警察（而非私人保安）干预罢工和抗议，冲突有时会升级，导致有人被殴打和逮捕。工人复工后罢工领袖经常会受到打击报复。

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罢工发生在今年 4 月份，东莞台资企业裕元鞋厂 4 万名工人停工，这次停工维权缘于过低薪酬和没有社保。最近的另一案例中，遭沃尔玛违法解聘的一名员工胜诉并获得损害赔偿，现在又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告上法庭。她指出当她被解雇时，工会认可了对她“不诚信”的评价，损害了她的名誉权，她的遭遇表明中华全国总工会未履行保护工人权益的职责。这两个案例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工人维权运动正方兴未艾。

一些工厂设立了“申诉机制”，让工人有机会就不公待遇提出申诉。虽然不能替代集体协议或工会，但有效的申诉机制有助于规范系统地处理和尽早解决问题。[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本地 NGO [社会资源研究所](#)基于《指导原则》非司法申诉机制的八项有效性原则，调研了一些工厂的申诉机制并发布报告。[有报道称富士康推动独立于管理层的工会直选](#)，但一些组织对其落实的速度表示忧虑。

b. 健康和安全问题（包括死亡事故）：许多行业还存在着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有时发生死亡事故）。根据报道，在电子产品代工厂里，有工人[死于爆炸事故](#)，有的[因工作场所的化学品而中毒](#)。采煤行业报告的死亡人数在下降，但[2013年还是有1049名矿工在事故中丧生](#)。2013年6月，吉林省[一家禽业公司发生火灾](#)，由于出口被锁，120名工人遇难。

2014年2月，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审议了安全生产法修正案](#)，旨在确保企业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加强监管，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这一进展值得鼓励，但能否有效执行对减少以后造成伤残和死亡的违法疏忽行为至关重要。

2010年富士康（苹果的主要代工厂，属于鸿海集团）多起工人[自杀](#)事件见诸报道后，全世界开始关注中国农民工面临的极端压力，这为改善中国年轻农民工所遭遇的困境和生活工作条件带来了一线希望。

2012年初，[苹果加入公平劳工协会 \(FLA\)](#)，意在通过此举解决代工厂的工作条件问题。同年8月，[FLA发布进展报告](#)，显示富士康在各方面有所改善，包括提供更安全的环境，但是很多员工依然超时加班工作。到2014年，苹果公开提供更充分的中国代工厂的情况信息。但是，虽然认可苹果在一些领域取得的进步，如缩短工作时间，对管理人员进行健康和安全问题培训，工人权利联盟等组织还是[认为](#)苹果许多改革的力度有些夸大其辞。

c. 童工：根据估计，2011年中国[工厂雇佣了10万名未达到工作年龄的儿童](#)。童工经常通过[实习计划](#)聘用，[劳动力短缺地区的企业尤其愿意采取这种做法](#)。因为[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童工的劳动权益更容易被侵害。中国劳工观察报告指出[三星代工厂海格国利电子公司 \(HEG\) 雇佣童工劳动](#)。[三星之后检查了 HEG 的工厂](#)，但说在实地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童工。2013年5月，在南方一家据报道为华硕生产部件的工厂，一名[14岁童工死亡](#)。该工厂的学生工说所有工人都是12小时轮班工作。

救助儿童会、联合国全球契约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制定的[《儿童权利与企业原则》](#)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有助于企业了解和解决对儿童权利和福利的影响问题，可为企业在与儿童有关的所有领域中（不限于童工）提供有益指导。[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第16号一般性意见](#)规定了国家在私营部门对儿童权利产生的影响中所承担的义务。

d. 强迫劳动：[2013年底，中国宣布废止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争议性劳动教养制度](#)（或劳改/劳教）。在劳教制度下，警察不需走法庭程序就可限制“轻微违法者”人身自由长达四年。该制度常被用于对付政治异见者和宗教犯人，批评者认为该制度破坏了法治。根据报道，劳教人员不得不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在工厂或农场受到折磨和殴打，他们生产的一些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尽管官方宣布将关闭劳改场所，NGO认为[迫害只是换了别的方式](#)，如虐待和折磨继续存在的戒毒中心和“黑监狱”。

研究发现，在[台湾的外国工人](#)（主要来自东南亚）[成为了债役的受害者](#)。这些工人为了支付高额务工佣金，不得不向中间人和放贷者借高利贷。到台湾后，他们的工作环境恶劣，而非原先许诺他们的体面环境。这些工人受到大量债务、合同、护照被用工者扣留以及被迫储蓄等因素的束缚而无法离开。

e. 歧视：在中国，就业存在的[健康、性别、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歧视屡见报道。[2010年国家禁止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法院还是收到了无数因携带乙肝病毒受到歧视的案件。[一名硕士研究生把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告上法庭](#)并胜诉，他因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被该研究院拒绝聘用。2013

年底，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调解结案。在此案中，一名女性控告一家私营培训机构（巨人学校）因其性别而拒绝接受她的应聘申请。[益仁平](#)是中国最活跃的反歧视 NGO，致力于为受害者提供援助，并开展倡导工作。

4.2 影响健康的污染

a. 抗议大型项目造成的污染：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企业环境问题对健康产生的影响。近年来由于怀疑大型项目损害健康而举行的抗议活动大幅增加。有的项目没有进行充分的、独立的、预先环境影响评估，因此其中一些抗议得以成功地改变或阻止了一些计划中项目。这些抗议通常[借助社会媒体的力量，如微博](#)（相当于中国的推特）。在数千群众上街抗议项目对健康的影响后，政府取消了[中石油计划在昆明建设的对二甲苯 \(PX\) 工厂](#)和[中国石化在茂名的 PX 项目](#)。由于公众的抗议活动，[什邡市政府中止了四川宏达公司的钼铜冶炼项目](#)。

但是，一些停工的承诺并未兑现。例如，2011 年曾[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大连 PX 工厂](#)在官员宣布工厂将关闭迁址后的几个月，据报道说[又悄然复工](#)。

b. 制造等行业造成的污染：NGO 联合组织“绿色选择联盟”（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和其他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报告，[指责国际技术公司的中国代工厂直接把重金属排放到当地水系中](#)。联盟发布的[后续报告](#)表扬西门子、诺基亚和沃达丰采取积极行动解决中国代工厂造成污染的问题。[苹果起初拒绝回复 NGO 的询问](#)，但是[后来与联盟领导者会谈](#)，宣布对 15 家代工厂展开调查，并同意公开大部分代工厂信息。在此期间我们几次联络苹果，希望对方公开回应。根据报道，各种项目排放的[污水](#)和[有毒气体](#)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如“[癌症村](#)”），[损害了当地居民的用水安全](#)。

2013 年 7 月，[绿色和平批评神华集团](#)（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在内蒙古的煤转油项目排放高浓度的有毒污水，抽取了 5000 多万吨地下水，导致当地农作物歉收，湖泊干涸。尽管一开始相关报道在国内受到了审查，[后来神华还是与绿色和平会谈，表示将停止取用当地水源](#)。

2011 年 7 月，[中国最大的海上油田在渤海湾发生严重漏油事故](#)，该油田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中国 NGO 指责相关企业和负责监督项目作业的国家海洋局掩盖事故，导致事故发生 1 个多月后公众才获得消息。2012 年 1 月，[两家公司同意支付 1.6 亿美元赔偿](#)渔民的损失。

在台湾，国立台湾大学 201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台塑集团在云林县的石脑油裂解项目排放致癌、损害肝脏的污染物](#)，[环保人士说，自从该项目开工，附近一个乡镇的患癌率上升到了台湾平均水平的 10 倍](#)。尽管当地人反对，[2014 年该集团还是申请扩建此项目](#)，并宣称“扩建项目与附近居民患病情况的关系还有待澄清”。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灾难后](#)，出于安全考虑，[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居民都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扩建铀设施，一些计划中的项目因此取消或暂停。

[中国环保部部长表示，重大建设项目一律要进行事先影响评估](#)。鉴于涉及环境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国务院明确规定](#)，凡是重大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社会风险”评估，但是对这些项目的影响评估通常都不是独立进行，或者甚至不进行影响评估。中国 [2014 年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加大了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但一些批评者对执法力度心存疑虑。为了协助企业了解并全面进行人权影响评估，[Nomogaia 推出了人权影响评估工具包](#)。

c. 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中国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常常成为国内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除了认为交通和工厂造成污染外，国有石油企业[中石化和中石油也常常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并不积极通过更新升级炼油厂来减轻空气污染](#)。但两家企业均为各自的环保记录辩护。

在香港，[香港地球之友的研究](#)显示，邮轮排放的二氧化硫是造成空气污染、危害健康的主要因素。在[我们呼吁公司公开回应并履行地球之友的要求后](#)，[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宣布](#)，首泊香港新码头的邮轮在泊岸期间会转用低硫柴油。

4.3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公司与政府合作侵犯表达自由及隐私

数字通讯和互联网是分享信息、组织民众的强有力渠道。ICT 公司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为创造更好生活带来了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卷入一些重大的侵犯人权行为：直接作恶，亦或协助政府和其他企业作恶。

企业帮助政府侵权最为人所知的案件之一是[雅虎 2005 年与中国政府合作，提供了雅虎用户同时也是](#)[一名民主活动人士的师涛的信息](#)，导致师涛之后被起诉入狱。[雅虎、谷歌、微软](#)和其他一些公司被控协助中国政府进行互联网审查。出于对在中国及其他地区发生这些问题的关注，这些公司与其他一些组织联合成立了[全球网络倡议](#)，旨在防止互联网公司参与违反表达自由和隐私权的活动。[2010 年谷歌宣布不再审查中国的搜索结果](#)，2012 年其搜索引擎被指违反了政府对搜索结果的规定而[被部分封锁](#)。

2011 年，[美国法院受理两起针对思科公司的诉讼](#)，[原告代表被羁押的中国异见人士](#)指控思科参与设计、实施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监控审查的技术工具，为政府提起的控告提供帮助：2014 年两起诉讼被驳回。

2012 年，《纽约时报》报道[宇视科技](#)，一家贝恩资本（总部设在美国的私人股权公司）所有的中国企业为中国提供监控设备。[贝恩对此做出回应，强调宇视产品所宣传的是作为打击犯罪、而非政治迫害的工具](#)。

许多中国 ICT 公司也协助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包括新浪（旗下有微博）、腾讯（旗下有消息类应用“微信”），例如[过滤搜索结果](#)和[删除敏感信息](#)。举报者由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倡导活动而被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倡导公开昆明炼油厂项目信息的微博博主](#)。（另请见第 5 节，中国 ICT 公司的海外活动）。

[微软](#)分享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应用所有人权原则的经验，中国 ICT 公司及在中国经营的其他公司可以从中有所借鉴。

据报道，中国企业还向其他专制政府提供设备。路透社消息说，[中兴公司 2010 年签订了向伊朗出售监控设备的合同](#)。之后中兴发布声明，在美国开始相关调查后，[中兴停止了在伊朗的业务](#)。2014 年 3 月，[人权观察组织发布报告，详细说明埃塞俄比亚政府所采用的技术](#)，协助监控国内外的政治异见人士对象。报告提到的中国公司中，[中新赛克](#)和[华为](#)回应了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中兴未做回应。（参加第 5 节了解更多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情况）。

4.4 强制拆迁/土地权利

[根据报道，地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常常串通一气征收土地](#)，用于建设厂房、基础设施、度假地和其它房地产开发项目。农民和当地居民的土地权利薄弱；地方政府经常是先把土地权卖给开发商，然后恐吓和/或强迫居民和农民迁走。

2011 年，一桩有关土地的纠纷吸引了广泛关注。[广东省乌坎村的村民控诉当地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据说为碧桂园，但该公司否认与此有关联）合谋强占他们的土地](#)。[一名参加抗议的村民被害，还有一些被捕](#)。不过最后当地政府释放被关押的村民，并把部分土地还给村民。

2012 年，据报道北京苏家坨镇村民因拒绝地产商提出的征地补偿标准而遭到骚扰及打砸，房子被强拆。2014 年，在争议土地边上的一个帐篷里，[一村民被烧死，两人受伤](#)。当地村民说这片土地被秘密卖给了地产开发商，而土地使用权所有者并没有得到合理补偿。

更多时候是警察（而非私人保安）参与镇压抗议活动，有时候使用暴力手段。[中央政府已经敦促地方政府加强保护居民权利](#)，但[进展缓慢](#)。[据报道，非法征地事件依然频发](#)。在许多此类案件中，涉及的地产企业隐身其后，未被曝光，由此导致了问责性的缺失。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代表的密切关系也意味着反抗他们的村民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

台湾[苑里镇居民自 2012 年以来一直积极反对德国风力发电公司英华威的一个风机工程项目](#)。民众担心计划建设的 14 个风机之间及距住户的距离过近，以及长期暴露在低频噪音环境中可能带来生理健康和情绪抑郁问题。居民还指控该公司聘请的海天保全公司的保安人员对抗议者使用暴力，但保全公司否认“用石头打人”，并声称其保安人员遵守法律。2013 年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在出访台湾时与社区进行了会谈。

4.5 食品安全问题 – 威胁公共健康和人权

媒体、政府和监督组织都对食品安全忧心忡忡，被曝光的问题包括[添加有化学物三聚氰胺的奶制品、含有毒添加剂的猪肉、添加了致癌物硝酸盐的豆芽](#)，以及被[重金属污染的蔬菜和](#)[大米](#)。2008 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给 30 多万儿童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并造成 6 名儿童死亡，这一事件引起了全民关注，并引发多起民事诉讼。该事件也显示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政治敏感性以及举报者所冒的风险。[组织民众抗议毒奶粉的赵连海因“扰乱社会秩序”被羁押](#)。

5. 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人权影响

截至 2011 年底，[有 18,000 家中资企业在全球 177 个国家运营](#)。我们 127 次寻求中资企业的回应，其中过半（71 次）针对发生在国外的指控（各国的分布情况参见 3.3 节）。这些案件反映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广度。

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采掘和基础设施行业](#)（中国技术公司在海外的经营情况参见 4.3 节）。我们最频繁寻求回应的问题有关安全和冲突区域、工人权益和强制拆迁（分布情况参见 3.2 节）。

丹瑞天然气管道和中缅原油管道两项工程跻身于缅甸最大的能源项目之列；中石油是两者的主要股东。[丹瑞天然气运动 2011 年的报告](#)和[2013 年国际地球权利组织及其他 NGO 发布的后续报告](#)指责参与项目的企业合谋犯下侵犯人权的罪行，如杀戮、强制劳动、性侵及其它暴力、拆迁补偿不公、歧视及环境污染。我们得到了[中石油](#)和[其他企业](#)对这些指控的回应。据报道，民众的反对使得项目延迟，但现在油气管道已经投入运行。

缅甸最大的铜矿位于[蒙育瓦的莱比塘](#)山脉，自 2012 年以来由万宝矿业公司（隶属中国北方工业集团）经营，当地居民对项目有诸多不满。数千名居民组织抗议，指控项目非法获取土地、污染钦敦江、破坏宗教传统以及造成周边环境损害。抗议者与安全部队对峙，一些积极分子被逮捕羁押。2012 年 11 月 29 日，警察镇压蒙育瓦抗议者，导致包括和尚在内的几十名抗议者被烧伤。抗议者的营地被烧，警察还使用了高压水炮驱散抗议人群。尽管调查委员会认为项目应继续进行，但村民继续持反对态度。

在柬埔寨，一些受影响[社区和 NGO 于 2012 年发起了旨在“让糖业公司停止剥夺柬埔寨农民土地”的运动](#)，其声称甘蔗特许协定“导致森林保护区被毁、水源被污染、数百户家庭被迫搬迁……农田被毁，家园被烧成平地，数千人沦入一贫如洗的境地，还有一些人因敢于抗议而被抓进监狱。”台湾[味王](#)是两家在柬埔寨榨糖公司的股东，其在[回应](#)中承诺倘若有任何证明两家公司自居民非法取得土地，公司愿意归还土地并对所有受影响的家庭负担全部搬迁费用。但是尽管包括泰国国家人权委

员会在内的许多第三方证实了指控的真实性，两家公司并没有履行承诺。目前此案在柬埔寨和英国引发诉讼（后者针对位于英国的购买商），以及无数旨在让被迫搬迁的村民得到补偿的活动。

马来西亚 200 名原住民[抗议建设穆仑水坝](#)，该水坝由中国三峡公司承建，沙捞越能源公司经营。项目计划淹没大约 250 平方公里的雨林和农田。[沙捞越在回应中表示](#)，直接受影响的社区已经确认了各自移民地的选择，并且“搬迁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在其回应中，[三峡公司确认](#)因堵车事件而停工的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正常。

在厄瓜多尔，[政府与中国所有的厄瓜考伦特公司（隶属于考伦特资源公司）签订了亚马逊地区的工业铜矿协议](#)，此举激发了大规模抗议，因为许多民众担心项目将会[严重破坏流域、生物多样性和原住民世代居住的领地](#)。八名妇女被警察逮捕。

在非洲大陆，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常常遭到批评：虽然政府欢迎中国不干涉政治事务的立场，民众欣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但这些通常伴随着高昂的环境和人权代价。此类事件包括[赞比亚科蓝矿山保安开枪致人死亡](#)，及[对津巴布韦钻石矿工手工采矿者的暴力行为](#)。（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收到了相关企业[中国有色矿业](#)和[安津公司](#)的分别回应。）[法国开发署的一份报告](#)分析了中石油在乍得的环境管理工作，并对其透明度和与受影响社区的沟通工作提出批评；[我们收到了中石油对此报告的回应](#)。2013 年 8 月，[由于发生原油泄露事故并出于对安全生产的关注，乍得政府叫停了中石油的业务](#)。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及对非洲专制政府的支持还有其他一些批评，包括[2008 年在津巴布韦选举结束后处于暴力混乱期间向其出口武器](#)。

中国的对外投资[继续快速增长](#)。中国的李克强总理最近访问了非洲四国，他[了解](#)对中国投资的批评，并敦促中国企业“遵守当地法律、尊重风俗习惯，履行好社会责任。”

6. 企业的法律责任

6.1 劳动争议

中国的工人可以通过仲裁、法院维护权益，但法律程序有时需要很长时间，对许多人来说也非常复杂。所有劳动争议都需要经过仲裁程序，尽管仲裁并不能予以民事赔偿。许多企业在败诉后会上诉，因而许多案件要经历初审、二审，有时还要进行再审。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白皮书，2010 到 2013 年间，[广州仲裁起诉率达到 52%，一审上诉率近 30%](#)。

中国法律规定，所有工会必须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独立工会是违法的。没有法律承认的独立工人代表，劳动者行使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就面临着障碍。很多时候，工人在参加完罢工后就被无理开除，法院或仲裁委员会也不会做出支持工人的裁决。但是 2014 年 6 月，[福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开除 40 名罢工工人的企业违法](#)。这是内地官方机构首次裁决开除罢工工人违法。

组织罢工的工人代表常常面临法律指控。[2014 年 5 月，广州为维护集体谈判权进行罢工抗议的 12 名工人被判构成扰乱社会秩序罪](#)，不过罢工领袖在法院裁决后很快被释放。另一名深圳的工人领袖[吴贵军](#)因扰乱交通秩序被捕，也在今年检察部门撤回起诉后被释放。

6.2 环保诉讼

最近几年中国针对企业造成的环境影响的诉讼明显增加。

自 2010 年起，[中华环保联合会 \(ACEF\)](#)，由国家环保部主管的有政府背景的 NGO，已经对一些企业提起法律诉讼，其中一些被环保法庭受理。2011 年 9 月，中国两家草根环保 NGO，自然之友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向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和云南省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倾倒铬渣造成环境污染。这是中国 NGO 提起的首桩环境公益诉讼。2012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允许对污染环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但是在修订出台后，ACEF 2013 年提出的 8 起公益诉讼均未被法庭受理。

2014 年 4 月新修订的《环保法》规定，只有在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才有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这样很多 NGO 都被关在了门外](#)。

6.3 其它趋势

原告在中国国内司法体系下得不到补偿时越来越多地在海外提起诉讼。2012 年 7 月，山东省渔民在[美国康菲公司总部所在地德克萨斯州的法院起诉该公司](#) 2011 年 6 月在中国渤海湾造成的漏油事故。渔民指出漏油污染破坏了渤海湾的生态系统，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生计。之前这些渔民在国内法院的起诉被驳回。参与起诉的渔民表示，因为在美国发起诉讼一事，他们被政府官员警告、威胁和监控。

2013 年 3 家 NGO [在法国起诉三星采用了“欺骗性的经营做法”](#)，未能履行其道德承诺，特别是在中国代工厂违反了使用童工和安全生产原则。

在一些案件中，一些管理层、员工和公司承包商被追究刑事责任。[2008 年三鹿集团诉讼（有关在中国的毒奶粉事件）](#)中，集团董事长、两名副总经理、奶事业部总经理被判刑。2011 年陆良化工有限公司一案中，包括员工和公司承包商在内的七人因非法倾倒铬渣被判入狱。

法律事务所在对企业侵犯人权的诉讼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发展倡导组织发布报告](#)，阐述了法律事务所执行《指导原则》的各种办法，其中基于律所针对客户、供应链和雇员的实践，建议了最佳做法和未来方向。

7. 有关工商企业与人权的重要活动

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中国 2011 年采纳《指导原则》。但是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广泛应用《指导原则》；同时尽管有成千上万个公益 NGO，只有很少一些真正基于《指导原则》开展倡导活动。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报告揭示了六家工厂的实践与《指导原则》存在的差距](#)，报告旨在帮助纺织企业建立符合《指导原则》的有效申诉机制。中国的一家 NGO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发布[基于《指导原则》建立工厂内非司法性员工申诉程序的报告](#)。SRI 还把一份有关 NGO 如何使用《指导原则》的报告翻译成中文。一些行业协会也已经开始参照《指导原则》，并在他们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中采用工商业与人权的用语，例如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的[《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和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矿业对外投资社会责任指引》](#)。

2013 年 4 月，联合国全球契约、负责任投资原则、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清华经管学院、全球企业与人权倡议（GBI）和中远集团合作组织了[海内外商业领袖和投资者圆桌会议](#)，交流了各自在经营和投资中实施尊重人权的思路和经验。

在台湾，台湾人权促进会在 2013 年一份季刊出版了[企业与人权专辑](#)，以引起各界对相关个案及活动的关注。

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的网站有[《联合国指导原则》](#)和[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辟出专栏，并提供包括中文和英语在内的七种语言版本。[《指导原则》的中文版面](#)提供从英语翻译成中文的指导材料和实施范例，旨在帮助中国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落实《指导原则》。

8. 结论与建议

与所有国家的企业一样，在大中华区运营的企业与在海外经营的中资企业都要按照联合国原则，尊重国际承认的所有人权。但是如果本简报所述，这两者目前的做法与《指导原则》中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国际合理标准还有很大差距。企业和政府强调经济收益和发展，通常都把人权影响视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因此予以忽略。一再发生的抗议罢工事件凸显了这一现状，也反映了工人和社区对本

地区企业人权影响的普遍忧虑。如果企业和政府不积极解决这些问题，民众会更加焦虑，更多抗议也会接踵而至。

政府与企业必须从整体考虑那些似乎不相干的问题（劳工、环境、互联网自由、土地权利、食品安全等）；与企业相关的人权问题通常有着紧密的内部联系，企业只有采取综合举措、统一工具才能处理好人权问题。把《指导原则》作为框架，可以帮助政府对企业进行适当的监管，帮助企业采取有效举措和创新手段，确保在经营中尊重、促进人权。《指导原则》也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国际语言，促进本地区内以及国际间各方力量的对话和合作。

基于本简报所述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针对企业的建议

《指导原则》第二个支柱“公司尊重人权的责任”阐述了对企业履行尊重人权责任的各项预期。

- **制订实施人权政策。**该政策应得到企业最高管理层的批准；有专家参与提供专门知识；规定对个人、商业伙伴的人权预期；对外公开；体现在业务政策和程序中。政策或相关培训应确保人权内置于全公司所有相关人员的日常活动中（即采购、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数据保护、法律部门等）。更多信息请参见[《指导原则》第 16 条](#)及我们有关[人权政策](#)的网页。
- **人权尽责和影响评估。**人权尽责包括对整个供应链和商业关系进行独立的人权影响评估，并利用评估结果指导商业决策。企业应对其在海内外的业务进行彻底、独立的影响评估。更多信息请参见[《指导原则》第 17-21 条](#)、我们有关[尽责](#)和[影响评估](#)的网页。
- **把人权问题内置到供应链的管理流程中。**在中国采购的企业要彻底解决其供应链中存在的劳工和环境问题。2012 年底，[Shift 主办了一系列商界领袖研讨会，为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尊重人权提供了实际指导](#)。
- **定期通报。**定期发布人权影响报告，披露实施《指导原则》的进展。更多信息请参见[《指导原则》第 21 条](#)、[全球汇报计划](#)、[报告保证框架计划](#)和我们有关[报告](#)的网页。[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社会资源研究所](#)的报告建议了在中国工厂建立非司法性申诉机制的最佳办法。
- **补救侵犯人权行为。**如果确实发生了侵权行为，企业必须要通过设立非司法性申诉机制来进行补救。[《指导原则》第 31 条](#) 陈述了确保这些机制有效的标准——更多工具与指导见[此处](#)。
- **与其他企业、公民社会和权利所有者合作。**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就人权尽责与公民社会磋商，或与权利所有者会谈了解企业业务对他们权利的影响。更多信息见[《指导原则》第 18 条](#)，如需有关重要概念（如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更多材料，请参见[这里](#)。

针对政府的建议

《指导原则》第一个支柱阐述了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指导原则》是一套普遍适用的全球标准。因此，大中华地区的国家及地方政府都应履行其有关工商业活动影响下保护人权的职责。

- **制定实施国家工商业与人权行动计划。**这些计划应该叙述政府迄今已经采取的步骤以及实施《指导原则》中有关国家的各方面义务的具体规划。很多国家已经制定了这样的行动计划，但本地区的政府还未开始此项工作。目前已有的计划和更多指南可参见[这里](#)。

尽管[中国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考虑到过去几十年企业力量的增强，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行动计划中有关企业人权影响的内容还远远不足。

- **颁布执行法律。**立法和监管活动是政府要求和鼓励企业尊重人权的重要工具，包括要求进行人权尽责和报告。更多信息可参见[《指导原则》第 3 条](#)。现有的尽责法规数据库在[此处](#)，更多范例和指导见[这里](#)。一些重要的法律修订都着眼于更好地保护人权，因此人权取得进展的下一关键步骤就是这些法律得到有效执行。
- **指导企业。**国家应明确规定对在其领土注册和经营的工商企业尊重人权的预期，其中包括扩大国资委和银监会所发布的指导意见和指引的覆盖面、影响力和实施范围（参见第 2 节），为需要具体指导的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参见[《指导原则》第 2 条](#)，更多指南见[此处](#)。
- **建立负责任的采购实践规范。**要求为政府供货或与政府有商业往来的企业在进行采购时，要进行独立彻底的人权尽责，执行《指导原则》。参见[《指导原则》第 5-6 条](#)，更多范例和指南见[这里](#)。
- **提供补救（救济）渠道。**国家应设立司法和非司法机制，使被企业侵权的受害者获得补救（救济），并出台治外规定，确保中资企业对海外造成的人权伤害负责。[《指导原则》的第三个支柱](#)阐述了补救（救济）途径，包括消除获得司法补救（救济）的壁垒，以及设立维护有效的非司法申诉机制。
- **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由于缺乏容易获得并且可负担的法律服务，中国的人权受害者往往很难起诉肇事企业。在不易获得法律援助的情况下，受害者往往通过抗议、罢工或其他方式来表达不能获得合理解决的诉求。我们建议政府通过增加法律援助资金、放宽法律援助领域、支持提供法律援助的 NGO、建立基于社区的法工（paralegal）项目、以及提倡律师提供人权公益服务等方式为受害者提供更易获得的法律援助。

9. 本简报作者

首席作者：周龙炜，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大中华地区研究员及代表：chow (at) business-humanrights.org

其他作者：程骞（大中华地区助理研究员）、吴亦镭（实习研究员）、Annabel Short（项目主任）
— 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

10. 关于资源中心

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是一家独立的非盈利组织，为全球民众提供企业对人权带来正面或负面影响的信息。我们是有关工商业与人权信息的集成领先者：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

资源中心网站追踪 5000 多家企业在 180 多个国家的人权影响（正面和负面）报道，为此领域的所有人员提供指导工具和资源。网站链接的信息来源包括当地草根组织、国家和国际 NGO、企业本身、国际机构和媒体报道。在链接含有对企业指控并且无企业回应的报告前，中心邀请企业做出回应，并把回应与报告放在一起。

我们的地区研究员在巴西、哥伦比亚、香港、印度、日本、肯尼亚、黎巴嫩、塞内加尔、南非、泰国、英国、乌克兰和美国工作。前联合国人员事务高级专员、爱尔兰前总统 Mary Robinson 担任中心国际咨询网络的主席。为保持独立性，避免任何利益冲突的嫌疑，我们不接受任何公司、公司基金会的捐款。

除此大中华地区简报外，我们还发布了[其他十几个地区/国家的地区简报](#)。
更多详情，请参见我们网站的[关于我们](#)。

[订阅免费的《每周快讯》，了解企业与人权的新闻大事。](#)

在此关注我们有关中国的报道：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zh-hans/中国>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网站资料建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大中华区研究员周龙炜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chow@business-humanrights.org。

[点击这里，现在捐款](#)

为了支持我们在大中华地区和全球的工作，支持我们为 global 民众免费提供信息，请考虑为我们捐款。我们不接受来自公司、企业基金会的捐赠，因此个人和基金会的捐款对本中心的持续运作至关重要。

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慈善机构（注册号：1096664），在美国是根据 *Internal Revenue Code* 第 501 条(c)(3)获豁免缴税的非牟利组织。